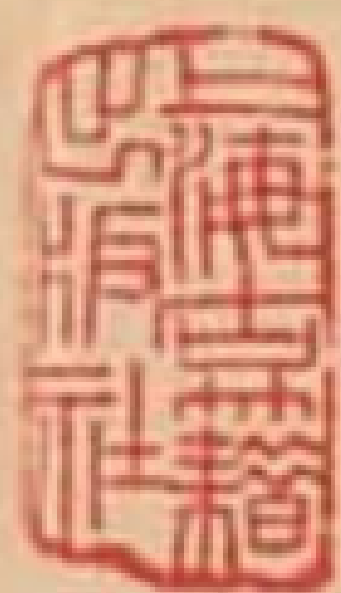


朱東潤文存

復旦中文先哲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朱東潤文存 / 朱東潤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11

(復旦中文先哲叢書)

ISBN 978-7-5325-7412-4

I. ①朱… II. ①朱… III. ①朱東潤(1896~1988) — 文集 IV. ①Z42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21573 號

本書為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資助項目

復旦中文先哲叢書

朱東潤文存

(全二冊)

朱東潤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 × 1240 1/32 印張 33.125 插頁 13 字數 880,000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300

ISBN 978-7-5325-7412-4

I · 2863 定價: 14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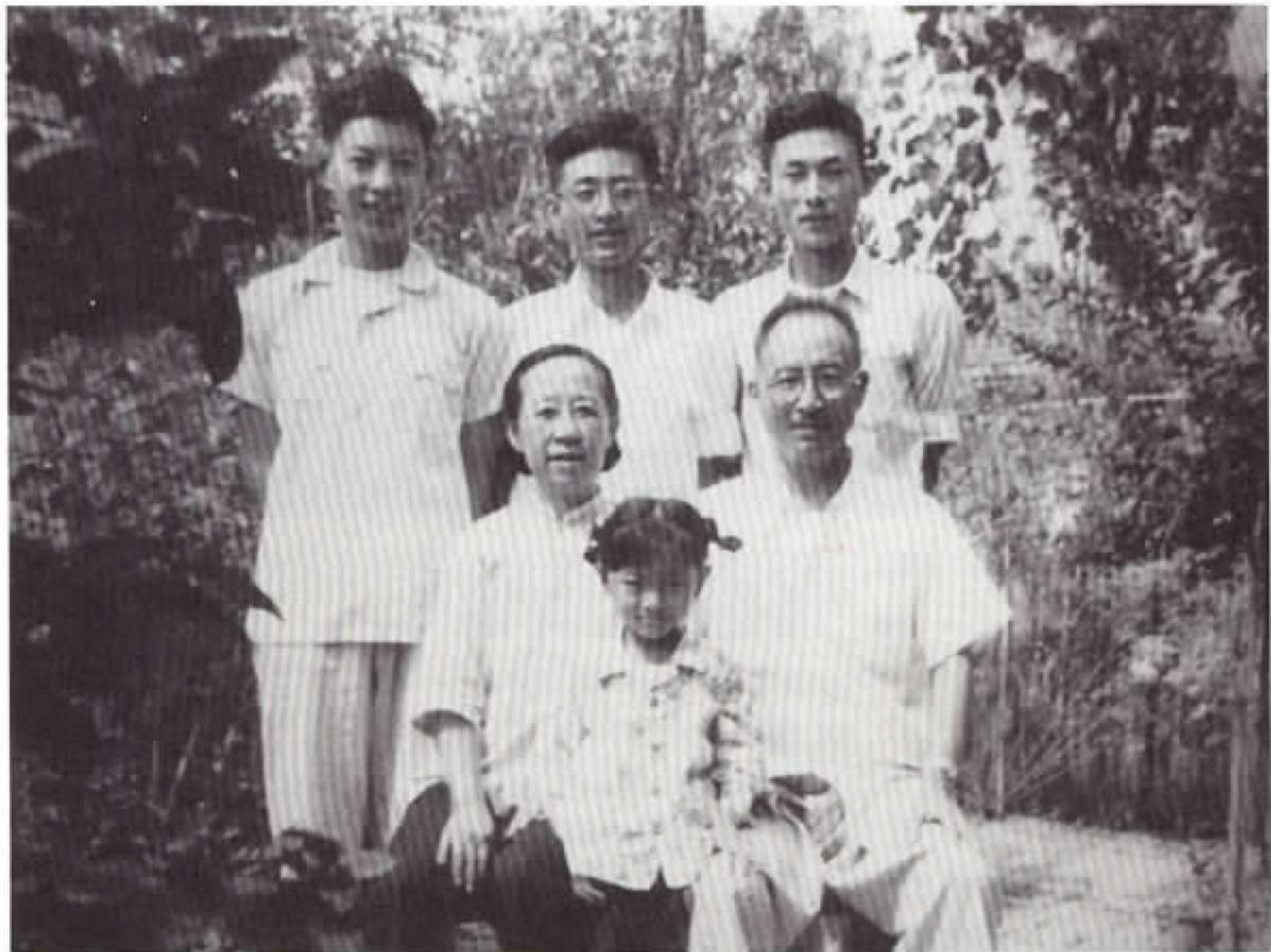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朱東潤先生七十歲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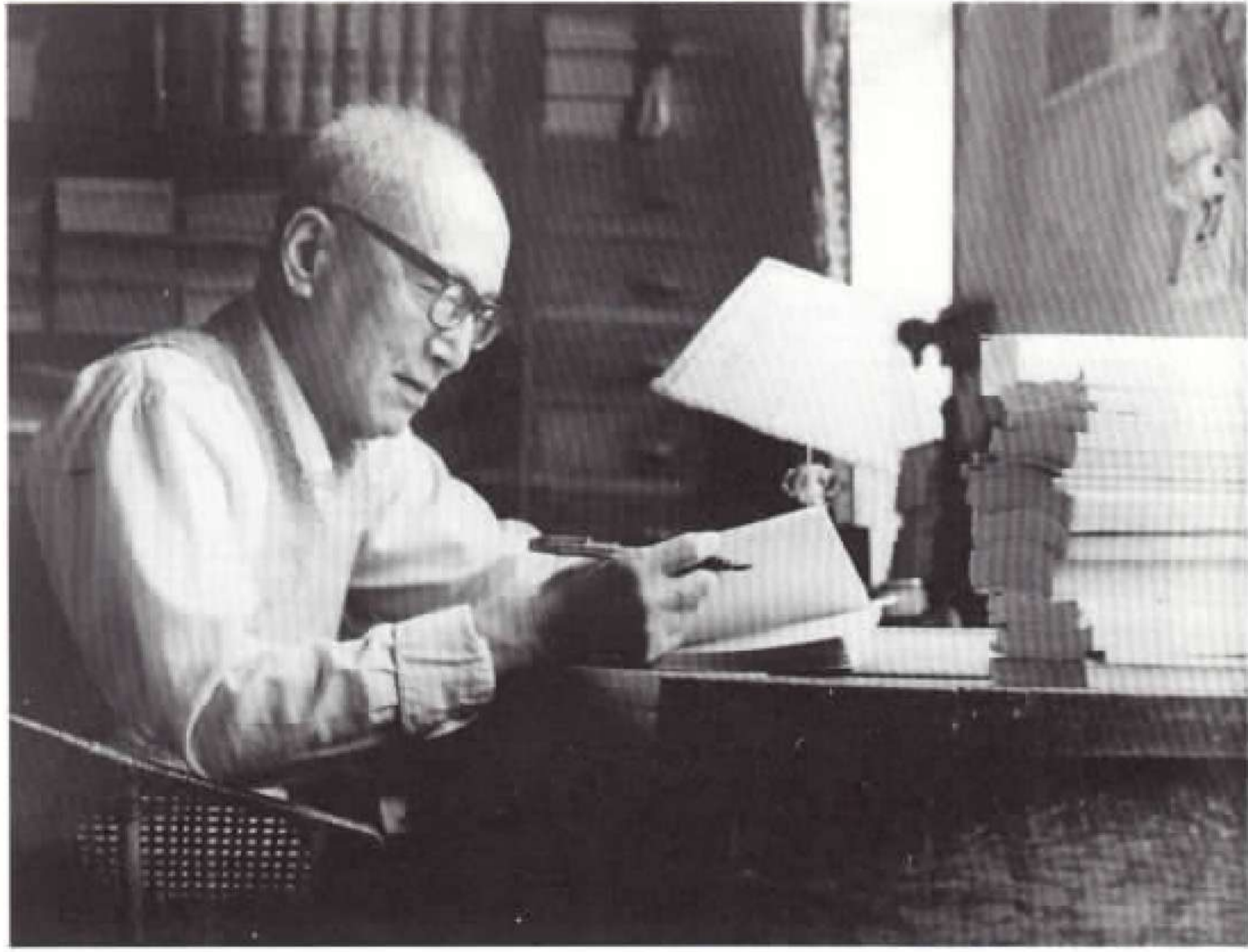


朱東潤先生結婚四十年與夫人鄒蓮舫女士合影



朱東潤先生夫婦與家人合影（約攝於1957年）

前中孫女朱邦薇；後左起：幼子朱君邁、三子朱君道、小女婿楊春元



朱東潤先生在復旦大學第一宿舍家中（約攝於1980年代）



朱東潤先生晚年習書



朱東潤先生與研究生黃寶華（後左）、陳尚君（後右）合影
（攝於1981年冬）

兒美猶漢人關城未解圍
鬻屋鐵馬瘦灌口米船稀
辨士宵邊策元戎波勝威
今朝烏鵲喜欲報凱謠歸

杜甫西山五律一首書意
易堂同志之序 朱東潤

朱東潤先生手迹

詩一

秋風正吹紅葉落
夕陽正照白雲飛
野老歸來無別事
山妻種地自忘機

少壯曾為江海客
老來方信世間非
閒心只在雲邊鳥
野性猶存石上磯

冷露中庭自滴秋
孤燈深夜自添愁
故人歸去無消息
只有寒蟬在樹頭

僧家也學漢唐風
一箇詩名一箇名
隨手拈來皆妙句
信手拈來盡好聲

詩以一日銷盡以
世間無事即神仙
文章作得如鐘鼎
文字如來似法華

落月滿地
清風吹竹
此景最宜
詩人吟詠

絕句
遠上寒山石徑斜
白雲生處有人家
停車坐愛楓林晚
霜葉紅於二月花

山行
遠上寒山石徑斜
白雲生處有人家
停車坐愛楓林晚
霜葉紅於二月花

詩史評語
此詩之佳
在於其
意境之
深遠

詩史評語
此詩之佳
在於其
意境之
深遠

朱東潤先生舊體詩作手稿

遺遠集叙錄(代自序)

《楚辭》：“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

七十五年的歲月，一去不復返了，血壓偏高，血管供應也不正常，因此想把七十五年的陳蹟留些下來。可是我有什麼成就呢？沒有，祇有些斷簡殘篇，對於遠人沒有什麼用處；但這是我僅有的東西，除此以外，沒有別的什麼了。集的本義是雜，繪畫羣鳥駐木之形，因此把這些篇幅湊合一處，於本義也相合。此外信手塗鴉，任其灰飛燼滅，希望後人不必東收西拾，災禍梨棗。

我生於1896年12月6日，在江蘇泰興縣城內蘇家巷老宅。宅內朝南一排六間，是伯父住宅，西三間六架梁堂屋，據說是明代的建築；東三間五架梁，分兩部分，靠西兩間為灶屋，靠東一間為走路。朝北一排五間是父親住宅，西三間四架梁堂屋，東二間三架梁灶屋。宅東有些房子，由伯父出租；宅西也有幾間，早由父親典出，後來在大哥當家時賣出。

伯父讀過一些書，但是始終沒有掙得一名秀才。父親石庵公沒有力量讀書，在一家茶葉店當店員。後來茶葉店歇業了，由於沒有重行就業的機會，祇有依靠典賣生活。在我出世的那一年，父親已經四十一歲了，生活非常蕭條，我記得灶間和靠灶間的臥室，多少還有些家具，堂屋西首兩間空蕩蕩地，和被大水沖過一樣。

我兄弟四人，大哥世淦字麗生，比我大十九歲，布店店員，在父親失業後，是家庭生活的主要負責者，但是他的收入也很微薄。二哥世溶比我大十一歲，在我四歲那年去世。三哥世滢字閏生，布店學徒，在將近滿師的那一年被解雇了，1906年從軍，1911年參加革命，在南京犧牲。

由於生活困難，在我幼年的時候，母親經常帶我到舅舅家寄食，所以我對於舅家的感情最深，特別是對於我的二舅母，她把母親當姊妹看待，對我也和對自己的子女一樣。

六歲那一年——實際還不足五歲，我就學私塾，在蘇家巷西首的一所破廟內，老師也姓朱，是同族的兄長，但是私塾終歸是私塾，經過三年的私塾生活，我感到很苦惱。到九歲那一年，泰興縣初辦小學，當時稱為蒙學堂，我入學後編入丙班，當年提升乙班。次年即1905年縣立高等小學招生，蒙學堂甲班生全部調出，作為豫備生，乙班生入選者兩人，我亦在內。這一年，父親由於貧病交迫，在三月間去世了。由於父親去世，我在學校免費膳宿，因此大哥的工資維持家庭，還能勉強應付。這一年十月間，由於鄉村人民對於學校的憎恨，搗毀學校。次年，三哥從軍，我改入幼幼小學甲班，仍是初級小學。1907年考入高等小學，這時我是正式生了。

在這一年夏天，由於族兄季鷹的主張，我到上海南洋公學附屬高等小學投考。當時大哥無力應付這個局面，但是季鷹兄的意思希望我到考場協助他的胞侄遺生，所以一力慫恿，面許支援。不料考場座位相去遼遠，無法照應。因此遺生落第，我錄取高等小學二年級。季鷹兄為形勢所迫，勉強維持我一個高等小學畢業的局面，聲稱不再資助了。這一年是1910年，虛年十五歲。

面臨着失學的形勢，學農既沒有田地，學商也當不成學徒，秋後開學，我徬徨無主了。幸得南洋公學校長唐蔚芝先生想起上年小學國文大會，我曾經錄取第一名，有心關切，其子謀伯兄約我來滬升學，學雜費由唐校長代付。因此我纔能升入中學。讀完中學二年後，還是無法應付膳費，終於退學，由同學陳通伯兄介紹至文明書局擔任校對。次年，同學鄭東啓兄

介紹至商務印書館擔任《小說月報》助理編輯。由於能力不及，試用兩月後解雇，我面臨着失業的危險。

在這一年，社會上正掀起一股勤工儉學的熱潮，提倡出國參加勞動，即以勞動收入，維持學膳。我參加了留英儉學會，1913年出國。可是到了倫敦以後，纔知道英國工廠和法國不同，不接受外國勞工，這纔想起繙譯書籍寄回中國，倚靠稿費維持學業的辦法。我在英國進了私立倫敦西南學院。這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寄出稿件，必須通過中國駐英公使館；寄來稿費，又因郵程阻隔，遙遙無期，到1916年被迫回國，結束了我的學生生活。

1917年，同學陳柱擔任廣西省立第二中學校長，他約我去教書。從此直到今天，我擔任了教師工作。這一年由母親和大哥作主，訂婚。1919年，調任南通師範學校教師，當年結婚。在南通師範前後十年，中間曾在南通中學兼課，前後三次。

1929年4月，由陳通伯介紹，到武漢大學擔任特約講師。此後一直在大學工作，最初是教外語，後來由該校文學院長聞一多的安排，準備中國文學批評史，1931年秋後開課，1932年改中文系教授。從此，我常在中文系。在武漢大學授中國文學批評史、《史記》。1942年調重慶中央大學，於前授諸課外，授《詩經》。1947年調無錫國學專修學校。1949年調江南大學，授文學概論。1951年調齊魯大學歷史系，授傳記研究、《史》《漢》研究。是年秋調滬江大學中文系，授文字學、工具書使用法。1952年調復旦大學，至今十有餘年，先後授中國文學批評史、史傳文學、傳記文學、宋元文學史、《左傳》、《文心雕龍》。

在中等學校工作的當中，開始對於學術的探討。既入大學，一邊由於工作的需要，一邊由於益友任憲忱、李劍農、譚戒甫、李雁晴等的協助，我的探討稍能深入，雖然限於自己的天資，無所成就，但是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沒有放過一個進修的機會，沒有浪費一些有用的時間。我的業餘嗜好，祇有書法，因為由大小篆入手，在文字訓詁方面，給我很大的幫助。至

於我早年對於外文的學習，在我的深入探討中，始終起了攻錯的作用。

在寫作方面，我在十七歲就曾為犧牲了的三哥寫過一篇小傳，刊登上海《民立報》。留英時，譯《歐洲新聞事業述要》，連載上海《申報》；譯托爾斯泰及其他諸家小說，刊登上海《小說時報》，或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在中等學校工作時，寫過英語教學法多篇，連載《英文雜誌》。從今天看，這一切都是徒費紙筆，除了偶然還能提醒自己的過去，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在大學工作中，編過《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易稿三次，在開明書店、中華書局先後出版。此外編過《宋元文學史講稿》、《詩經傳箋講稿》、《左傳講稿》、《史記講稿》、《文心雕龍講稿》、《傳記文學講稿》、《工具書使用法講稿》，這些都是臨時講授用的，現在概不收錄。

讀 詩 四 論

這是發表最早的，也是用力最多的著作。194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內容有《緒言》、《國風出於民間論質疑》、《詩大小雅說臆》、《古詩說摭遺》、《詩心論發凡》五篇。其中《國風出於民間論質疑》一篇，先後費時二年，始能寫定。

在講授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我認為中國文學都和《詩經》、《楚辭》有深切的關係，不理解《詩經》、《離騷》，不能理解中國文學。我讀《詩經》的時候，每篇就魯詩說、齊詩說、韓詩說、《毛傳》、《鄭箋》、孔穎達《毛詩正義》、呂祖謙《讀詩記》、朱熹《詩集傳》、陳奐《詩毛氏傳疏》、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姚際恒《詩經通論》、龔橙《詩本誼》以及其他諸家之說，求其意義。蘇雪林聽到以後說：“這樣讀法，哪一天讀完呢！”但是畢竟給我讀完了。我所得的結論是這些：

（一）全部《詩經》，包括百六十篇《國風》在內，都不是民間的作品。對於《國風》，我列舉八十個證據，證明這是統治階級的作品。《毛傳》所

謂“國人”，實際是其國的士大夫，並不是人民。這一切都有實證可據。事實上，自從人類分爲階級以來，統治階級從來沒有把被統治者的作品作爲朝聘盟會中的雅樂，更何況春秋時代的人民，還處於農奴的地位，連人身自由都沒有！人民當然是會用歌唱發抒他們的感情，例如鄭國的輿人之誦，宋國的城者之謳，但是這些都沒有收入《詩三百篇》，因爲這些祇是農奴的歌唱，不登於大雅之堂。我在《國風出於民間論質疑》篇末，更列舉可能的五種異論，加以駁斥，以申《詩三百篇》不出於民間之說。

(二) 前人以爲《國風》是民間之樂，大小《雅》是朝廷之樂，我在《詩大小雅說臆》裏指出詩大小《雅》就是詩大小夏，本來“雅讀爲夏”，自王引之已經發其說，我認爲大雅即大夏，指岐周，小雅即小夏，指京周。我說：“周者地名也，而夏則爲部族之名。周人之稱周，蓋起於古公亶父，自是以後，周人自稱，周、夏二字互用；未至周原以前，周人不稱周也。”

(三) 世人多以《詩三百篇》爲儒家的經典，我在《古詩說摭遺》指出不獨儒家，墨家亦言《詩三百》，甚至《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亦言詩。諸家言詩，與儒家所說亦有出入。這就打破儒家對於古籍的壟斷。

(四) 最後我在《詩心論發凡》更通二千年古今之郵，認爲時代雖然遠隔，感情原無懸殊。篇末我指出：“吾嘗諷誦《詩》三百五篇而覺有不能已於言者。《詩》三百五篇之中，憂生歎世之作，不絕於目，然猶未盡至於怨、盡至於怒也。何則？其人大抵皆統治階級之流亞，生活縱不盡裕，尚未瀕絕境，故‘權輿’雖有‘不承’之歎，而輿嗟猶在‘每食’之後。假令全國人士，泰半皆有一飽無時之感，而其人又向無素養，既不能如《衡門》之作者，泌水療飢，怡然自樂，又不甘如《苕之華》之作者，‘鮮可以飽’，自咎其生，則其鬱結之憂思，浸假而爲怨毒，浸假而爲憤怒，又浸假而由思想及於行動，如水時至，如火燎原，將何以善其後？觀今日之詩壇，趨勢已如此矣，善後之策，此吾之所欲聞也。”這是一個預言，而這個預言，在不久以後，完全證實。

這本著作的主張，有許多前人沒有說過，甚至今人沒有想過的。陳通

伯說：“這本著作，用文言寫的，新人物不要看；充滿了新見解，舊人物也不要看。”這是一句中肯的批評。一位老教師說：“我看了幾頁，就把它一丟。”這一句繪影繪聲的語言，不啻是他的自畫像。

詩 教

1934年武漢大學《珞珈月刊》發表的文章，指出《禮記·經解篇》所舉孔子之言“溫柔敦厚，是詩教也”之語不可信。這原就王夫之、袁枚的主張而加以引申。我說我們讀《詩三百篇》，當知詩是一切感情的表現，無論是和平，是悲怨，是懽愉，是憤慨，總是各如其分的表現出來。假如詩教的話是孔子說的，那麼孔子也止說了引詩的功用，並不是說作詩的意境。

怎樣讀《詩經》

1943年作，付《國文雜誌》發表。

當時對於讀《詩經》的看法有兩種：有人主張把它當文學讀，有人主張把它當經學讀。當文學讀的多半是通過《詩經》談些男歡女愛，當經學讀的則要在經文裏追求微言大義。我的主張是要徹上徹下的讀。

我說：“平實一點說，做學問要有一副徹上徹下的精神。怎樣是徹上徹下？我們決不在一種學術裏割據一方，好像學問的對象，止是這一個角落，其餘都是邪門外道。坐井觀天，所看的永遠是這樣的一角，而且因為不曾看到天的全體，對於這一角在天體中的位置，便無從估計，無從認識，所以對於這一角的認識，也就無從正確。換句話說，坐井觀天，其實等於沒有觀到天。一部《詩經》的範圍，其實算不得怎樣大，假如在這裏再築起牆壁，這是經學，這是文學，豈但治經學的不懂文學，治文學的不懂經學，

正恐治經學的沒有懂得經學，治文學的沒有懂得文學，所以要有一副徹上徹下的精神。在讀《詩經》的時候，且不要說我是把它當經學讀，或是當文學讀的。我們研讀的對象是《詩三百篇》，是全書的真相，而不是全書的某一方面的真相，或甚至某一方面的幻象。《詩三百篇》不一定全讀得明白，但是對於讀得明白的若干篇，總要徹上徹下，交代出一個是非來。在我們得到這個真相以後，那麼我們還是把它當經學讀呢，或是當文學讀呢？自然有替人家戴帽子、掛招牌、分門別類的先生去起勁，我們不管，我們所管的祇是徹上徹下要一個真相。”

我認爲《詩三百篇》經過了長期的散亂的時代，到現在還保存着《詩三百篇》的原數——連《商頌》說，其實是三百五篇——是一個奇蹟。散失的已經散失了，補進的又怎樣補進的呢？這是一個有興趣的疑問。根據《左傳》定公十二年楚子論詩，我認定武王的《武》詩，在春秋時，這一篇至少有七章，但是在今本《詩三百篇》裏，便割裂爲好多篇了。證以《古文尚書》割《虞書·堯典》下半篇爲《舜典》，割《皋陶謨》下半篇爲《益稷》，以及《古論語》割《堯問》下章《子張問》另爲一篇的事實，我們看到割裂古書，湊足篇次，正是古人的常事。連帶地我們也可以推測許多的逸詩，本來祇是《詩三百篇》內原有的篇幅，但是在漢儒重行編次的時候，因爲不曾引起他們的注意，從此便永遠排出《詩三百篇》的目次以外，所以這些逸詩祇是逸在孔子的身後，而不是逸在孔子的生前；這份刪詩的工作，其實孔子不曾做得，而祇是經過時代的淘汰以後，又經過漢儒的刊落。

對於《詩三百篇》的注釋，我認爲魯詩、齊詩、韓詩多用本字，毛詩多用假借字。三家詩祇留下一些輯存的殘迹，《詩三百篇》用字的真相，便無從看到。幸虧在《毛傳》成書的時候，還知道一些本來的面目。其後鄭玄替《毛傳》作《箋》，曾經看到三家詩，也還能在《毛傳》沒有顧及的地方，加以適宜的補充。盲人出門，時時需要一根明杖，有眼的人，本來無需乎此，但是盲人的明杖，不能不算是一件必要的工具。朱熹《詩集傳》有時從《傳》不從《箋》，有時從《箋》不從《傳》，有時對於《傳箋》，引用《韓詩》、《左

傳》、《周易》、《楚辭》，或另外一首詩的《傳箋》，加以必要的訂正，有時甚至根據常識，加以斷然的更定。這些地方都看出《詩集傳》的價值。

《詩三百篇》成書中的時代精神

1946年作，付《國文月刊》發表。

《詩三百篇》舊傳以為孔子手定，詩中所指實之故事不一，其時次最後者為《陳風·株林》一篇。《小序》：“《株林》，刺靈公也。”靈公在位十五年，即紀元前613至599年。此外則《邶風·燕燕》一篇，據《列女傳·母儀篇》定為衛定姜送其姊之作，詩言：“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此詩作於定公之子獻公時可知，獻公在位三十三年，即紀元前576—544年。假如《詩小序》及《列女傳》之言可信，那麼《詩三百篇》成書之日，當在這兩個段落以後。

《左傳》昭公十六年（前526），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可見宣子不知道鄭詩，所以有這個要求。這是說直到昭公十六年，《詩三百篇》還沒有成為定本。

但是孔子一次說“詩三百”，兩次說“誦詩三百”。在孔子設教的時候，《詩三百篇》已經成為定本了。假如我們認為《詩三百篇》成書，在韓宣子聘鄭以後，那麼此書底成立，恰恰在孔子壯年或中年（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歿於哀公十六年，即紀元前551至479年）。

這部書完成的時候，時代精神正如成十六年《公羊傳》所說：“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簡單地說，這是民族主義高漲的時代，時代的使命是追求諸夏民族的團結，一致抵抗異民族底侵畧。

孔子是有這種時代精神的，所以他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他一再稱管仲“如其仁，如其仁”。這種精神到孟子時代，便完全失去了原有的意義，他甚至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不能理解孔子，

不能理解《詩三百篇》成書時代的精神，主要地因為春秋時代擯斥於諸夏之外的楚、狄已經起了變化，楚參加了諸夏的集團，狄已經被擊潰，不構成對於諸夏的威脅。

可是在春秋時期，楚人畢竟是蠻夷。僖二十二年，宋襄公與楚人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公羊傳》）即在楚人自己也採取和諸夏對峙的立場。襄十三年，楚共王卒，子囊稱為“撫有蠻夷，奄有南海，以屬諸夏”（《左傳》）。這更透露了楚人和諸夏對抗的意境。

在“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的境地裏，有識的政治家底主張，當然是團結諸夏以抗夷狄，一部《左傳》裏充滿着這種精神的記載。《公羊傳》所傳的孔子的微言大義，也就是這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的精神。

時代精神在政治方面的表現如此，在學術方面，是急遽地完成幾部民族的巨著。除了《春秋》尚在寫定，《周禮》、《儀禮》時代畧後，《禮記》直到漢代纔能完成以外，這時正在陸續完成《周易》、《尚書》和《詩經》三部巨著。

我們瞭解《詩三百篇》完成中的時代精神，然後可以瞭解《詩三百篇》。這是中國文學的結晶。瞭解《詩三百篇》以後，我們纔知道為什麼中國詩人充滿了苦難，然而也具有堅強的精神，纔能知道為什麼中國人雖是不斷地遭着外來的患難，然而最後還是一個不能克服的民族。

《公羊》探故

1947年作，付《學原》發表。

《春秋公羊傳》相傳出子夏弟子公羊高，至漢景帝時寫定；書中屢稱子公羊子、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北宮子、子女子，以及魯子、高子之說，則此書不出於公羊高可知，所謂子公羊子等諸人，大抵出於七十子之後，漢景